

史达祖事迹略考

吕 艺

南宋词人史达祖未中进士，身份低贱；又由于他曾当过南宋宁宗时权相韩侂胄的属吏，且与韩关系密切，后世正统史家“不屑道其姓氏”。^①历史上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资料既少又不系统，一些问题目前尚不能解决，只能付之阙如。

史达祖字邦卿，号梅溪。祖籍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大概是因为“靖康之难”，父辈迁至江南的。今传《梅溪词》一卷。

史达祖的生卒年，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台湾周宗盛先生在《词林探胜》中以为：“大约与姜夔同年出生于西元一一五五年。卒于西元一二二〇年。”不知何据。仅就生年而言，这种说法有不少疑窦。

张炎曾祖、南宋词人张镒（号约斋）曾为《梅溪词》作序，张镒出生在高宗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，比姜夔大两岁。如果按周先生的说法，也比史达祖大两岁。但是序云：“汴人史生邦卿…俄起，谓余曰：‘某自冠时，闻约垒（斋）之号，今亦既有年矣’”。可见史达祖刚二十岁，张镒就早已成名。这就很难说，他们只相差两岁。下文又言：“余老矣，生须发未白，数路得人。恐不特寻美于汉，生姑待之。”亦可见他与史达祖决非一两岁之差。又说：“生满襟风月……，余方以耽泥声律，而颠踣摈弃。今又区区以勉生，非感耶？”也俨然是老前辈勉励后进的口气。所以我认为史达祖的生年，应该在绍兴二十五年，即一一五五年之后。至于确切年代，因资料缺乏，暂不可考。

史达祖家境贫寒，其《满江红·书怀》词叹道：“未暇买田

“精颖尾，尚须索米长安陌，”可见境遇的窘迫。这大概是他未能进士及第，便当了为士人不齿的堂吏的原因之一。

史达祖为韩侂胄属吏的起始时间，现在尚不能确考，当在宁宗嘉泰元年(1201)或以前。张镃序曾说：“数路得人，恐不特寻美于汉，生姑待之。”确切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。

宋代入仕之途，主要有科举、恩荫、荐举等。概括起来，可分为两大类：科举及第，就有了“出身”，一般以文士自居；而恩荫、荐举等及考书、算、律等入仕的，首先要为吏，然后通过轮选，逐渐升迁。通过此途入仕的，职位低，升迁慢，升迁程度往往有限制。如：“建炎初，李伯纪为相，建请堂吏出职止通判，从之，迄今不改。”^②《燕翼贻谋录》卷四也说：堂吏“不得为知州。”因此“士大夫耻与为伍。”张镃所谓“数路得人”之“数路”，就是指宋代入仕之路，但不外乎这两类。何谓“恐不特寻美于汉？”结合上文，当然就考选制度加以比较。汉代无科举，考选有任子、资选、学校、察举等数途。而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士与吏之间没有明确的贵贱界限。吏可以是通儒，可以位至高官；儒士也常当胥吏。且撇开汉代开国元勋、原为沛县胥吏的萧何、曹参不说，西汉由吏至高官的不少，张汤“为长安吏”，^③后位至御史大夫，“丞相取充位，天下事皆决于汤”；^④丙吉本“治律令，为鲁狱吏，”^⑤宣帝时位至丞相，公孙弘以吏为儒，武帝时位至丞相；龚胜以儒为吏，哀帝时为光禄大夫。正所谓“公卿多出胥吏，而儒雅贤厚之人，亦多借径于吏以发身。”^⑥东汉时，虽然意念上士与吏渐有别，但一般并不妨碍仕途上的进升。如袁安“初为县功曹”，^⑦明帝时为楚郡太守、河南尹，名重朝廷，东汉末年胡广，“随辈入郡为散吏”，^⑧后“历事六帝，礼任甚优”，^⑨“一履司空、再作司徒，三登少尉，又为太傅”。^⑩了解这一特点，再看张镃原话，就容易理解了。张镃说：“从各种途径得到适当的人才，恐怕不只可以和汉代相媲美。”这是委婉的说法，既然偏偏与无科

举、进士的汉代相比，可知张镃的言外之义即：你虽当了胥吏，但恐怕也会象汉代那样得到高升吧。所以勉励史达祖“生姑待之。”这样理解不错的话，那么，张镃作序之年，即宁宋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史达祖应该已经当了属吏。

另外，《宋史》卷三九四陈自强传云：

陈自强…常语人曰：“自强唯一死以报恩王。”每称韩侂胄为恩王、恩父，而呼堂吏史达祖为兄，苏师旦为叔。

陈自强是韩侂胄的童子师，淳熙五年（1178）进士。庆元二年（1196）夏因铨选到临安，受到韩侂胄的推重，四年之内，屡迁至签书枢密院事，后位至右丞相。因此他对韩侂胄感恩不尽。韩侂胄被封平原郡王，在庆元五年（1199），此时陈自强已屡得升迁，他要呼韩侂胄为恩王，自然应当始于此时。而呼史达祖为兄，也应与此时相当而不至相差年代过远。阮元《续资治通鉴》用此条材料时，系之嘉泰三年（1203）目下，但是以回述的口吻记载此事。因此，我以为定史达祖当韩侂胄属吏的时间约在嘉泰元年左右，还是合适的。

此后，史达祖主要活动在临安，与高观国，张镃、赵子野等人交往。或泛湖探胜，或结社作诗、词，创作了不少作品，特别与高观国交往甚笃。嘉泰元年，史达祖编成自己的诗集，由张镃序“史生邦卿…出词一编”语可知。但考今集中，有明确标年的，已至嘉泰三年；从词的内容看，有些似乎还作于被贬之后，显然是自己或后人改编过的。

开禧二年六月，^①因北伐失利，苏师旦被罢职。苏师旦本为平江（治今苏州）书佐，因韩侂胄力而得官。韩侂胄“以其辨慧，爱之”，^②朝政大事常与之参议。他被贬后，史达祖更得韩侂胄倚重，“事无决，专倚省吏史达祖，奉行文字，拟帖拟旨，俱出其手”。^③给事中雷孝友开禧三年（1207）十一月的呈札中也说：苏师旦既逐之后，堂吏史达祖、耿怪、董如璧三名，随即用事，言

无不行。”^⑭

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，韩侂胄被杀。不久，史达祖也被以“公受贿赂，共为奸利”^⑮的罪名，“送大理寺根究”，^⑯被处黥刑。此后史达祖的行踪已不可考。其《满江红·书怀》（我认为此词盖作于被贬后）云：“三径就荒秋自好，一钱不值贫相逼”，大约是穷愁潦倒以终的。

下面谈谈史达祖使金问题。

清人厉鹗、查为仁所作《绝妙好词笺》曾涉及这一问题。卷二照录了史达祖《龙吟曲》“陪节欲行，留别社友”词，笺曰：“按梅溪曾陪使臣至金，故有此词。”但对出使时间、路线、在此期间有何创作等，均未提及。仅凭这一首词，尚不足以证明史达祖确曾使金。

我想先考查史达祖使金路线，由此证实史达祖曾否使金？《梅溪词》中几首词的词题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即：

《齐天乐》：“中秋宿真定驿”；又“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”；《鹧鸪天》：“卫县道 有怀其人”；《惜黄花》“九月七日定兴道中”；及上所云《龙吟曲》。我认为五词皆作于出使期间。

考《金史》卷二十五《地理志》，“河北西路”下有真定府（治今河北正定县），原为“宋常山郡镇州成德军节度”，下有真定县。同卷同路下又有潞州，原为“宋大邳郡通利军、又为平川军”，下有卫县（今属河南）。卷二十四“中都路”下有定兴县（今河北定兴县），“金世宗大定六年（1165），“以范阳县黄村置”。南宋自高宗渡江，“中原、陕右尽入于金，东画长淮，西割商、秦之半，以散关为界……”。^⑰这三地当时皆属金，如非出使，史达祖当不会至此。另一首《齐天乐》“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”值得注意。这里的“京”指何地？北宋有四京：东京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、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县南）、西京河南府（今河南洛阳）、北京大名府（今河北大名）。至南宋，升杭州为

临安府，“以州治为行宫”，^⑮称为“行在所”。俗呼“行都”。“行在”，但不称为京。因此词题之“京”，显然是沿袭北宋旧称。但北宋四京中，西、北、南三京都是行都，一般不能简称为“京”，而且从词的内容看：“双阙远腾龙凤影，九门空锁鸳鸯翼，更无人抚笛傍宫墙，苔花碧”，也显然是指汴京旧宫。词人至此，抚今追昔，因而怀古叹息。这样，便基本可以确定，史达祖使金路线是：临安——汴京——卫县——真定——定兴——中都。

这样一条出使路线当时是否确实存在？考宁宗嘉定四年（1211）出使金朝的程卓所撰《使金录》，回答是肯定的。现从中节录几段文字：

“十一月五日癸丑陛辞，十一日己未出国门，二十四日壬申至盱眙军（治今江苏盱眙）”。“二十九日…绝淮…入泗州（治今江苏泗洪县东南）驛。”十二月，“八日…黎明至东京门外…入要利门，过储祥宫宾曜门过大相国寺…”。“十三日…早顿卫县…”。“十八日…宿真定府南门外…”。“二十三日…宿定兴县巨川驛。”“二十七日…拂晓，至恩华馆。”

书中所记出使路线是：临安——盱眙——汴京——卫县——真定——定兴——中都。

在此之前，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范成大也曾使金。其《揽辔录》和今《石湖居士诗集》卷十二，皆述此事。由此考察范成大出使路线，与《使金录》所记完全相同。三书所言，与史词正合。则史达祖确曾陪同宋使往金无疑。不过，史达祖从临安至汴京，倒并非一定是从盱眙渡淮水至泗州再向西行的，当时还存在另一条自濠州（今安徽凤阳东）渡淮至汴的路线。开禧三年方信孺使金，即走此道。但这并不能否定史达祖使金的事实。

史达祖使金的月份，我认为六月至十一月。

南宋使臣往金，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为了两个目的：贺金正旦和贺金主生辰。此外如有事，再派专使。贺金正旦使正月初一前

必须赶到，贺金主生辰情况则较复杂。金主生辰日或规定的生辰日都命名为节，各主生日不同，节名和庆贺时间也各异。如金太宗天清节，在十月；金熙宗万寿节，在正月等。但实际上，金主的生辰节与其生日有时并非一致。如金熙宗，“本七月七日生，以同皇考忌日，改用正月十七日。”^⑨金章宗也是这样。《金史·章宗纪》载：“大定八年（1168），世宗幸金莲川。秋七月丙戌，次冰井，上生。”^⑩但章宗即位，却“敕有司移报宋、高丽、夏，天寿节于九月一日来贺。”^⑪史达祖陪同使臣，就是去贺金章宗天寿节的。这从史词中所记在真定、定兴、汴京的时间可以确定。

史达祖在上述三地的时间分别是八月十五日、九月七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及前二三天^⑫。真定在定兴南、汴京北。如果三词都作于去时，则在真定的时间不应早于在汴京的时间；如果都作于归时则在真定的时间又不宜早于在定兴时。或者是史达祖在真定和定兴时在去途，在汴京时在归途？但据《使金录》，真定到定兴只需五天左右，而中都到汴京需十九天左右。史达祖自真定到定兴却用了二十多天，时间何其长？从定兴到中都，再从中都到汴京，中间还有在中都逗留的日子，一共只有十四、五天，时间又何其短？因此只能有一个解释：史达祖在真定的八月十五日，是在去途；而在定兴和汴京的九月七日、九月二十一日前后，则在归途。

由真定到中都，约需十天左右。《使金录》载程卓等十二月十八日到真定，二十七日达中都。史达祖等亦应在八月二十四日左右达中都的。《使金录》又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兴，二十七日至中都，则史达祖在定兴的九月七日，当是九月二、三日从中都出发的。这显然是为了贺章宗天寿节的。又据“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”：“缓辔西风，叹三宿迟迟行客”，史达祖归至汴京盖九月十八日左右。《使金录》载汴京至中都约十九天，也正与史达祖九月初出发至汴京的时间基本相合。则史达祖等为贺金章宗生辰而使金无疑。

宋使自临安至中都，一般需两个月至三个月。贺金正旦使一般自十月出发；贺金章宗天寿节使一般出发于六月。光宗在位五年，贺天寿节使皆发于六月；《宁宋纪》中，除庆元三年、开禧元年缺载外，至开禧二年北伐不通使节止，贺天寿节使亦都发自六月。史达祖等亦应六月出发。《龙吟曲》中说：“道人越布单衣”、“风沙短帽”，也正与时令相合。九月初从中都回归，至临安当在十月底、十一月间。

史达祖出使之年，现在尚不能确考，我认为当在开禧元年（1206）或嘉泰四年（1204）。

开禧三年十一月，史达祖被处黥刑，此后不可能陪使往金，使金只能在此之前。但又不可能在开禧二年和三年中。因为开禧二年五月，宁宗下诏北伐，两国遂不通使节，此年天寿节，唯高丽使前往；开禧三年至六年，南宋倒曾遣三使：通谢使、告哀使、贺生辰使使金，但因战事未止，都被却回^②。这年四月，曾派方信孺使金议和，后“自春至秋，使金三往返”，^③但只到当时金左丞相兼都元帅宗浩所驻之汴京。

我以为史达祖使金在开禧元年或嘉泰四年，主要从史达祖《满江红》、《龙吟曲》二词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及情绪特征来判断的。

《满江红》“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”中云：“天相汉、民怀国、天厌虏、臣离德。趁建瓴一举，并收鳌极。”这正与当时金国内外交困、中原人民怀念故国、南宋朝廷决议北伐的历史背景相合。金朝立国以来，北部边境经常遭到阻卜、蒙古部落的侵扰。章宗即位后，明昌六年（1194）曾派夹谷清臣北征。此年，“北阻卜…叛击，大侵扰，”^④章宗遂命右丞相完颜襄代替夹谷清臣。不久，完颜襄与完颜完国分兵两路北击阻卜，此后又多次领兵征伐。同时，蒙古的广吉刺、合底忻、山吕昆等部也不断骚扰，“北部广吉刺者尤桀骜，屡胁诸部入塞”。^⑤宗浩等又于章宗承安三年（1198）北征。连年征伐，军资“随路赋调，促期徵敛，使民费及

数倍，胥吏又乘之以侵暴。”^①加之黄河泛滥、天旱等灾害，真可谓“兵连祸接、士卒涂炭，府仓空匱，国势日弱，群盗蜂起，赋敛日繁，民不堪命。”^②所以到嘉泰三年（1203），“是冬，金国多难，惧朝廷乘其隙，沿边聚粮增戍，且禁襄阳榷场。边衅之开，盖自此始。”^③这年冬天，“知安丰军厉仲方言淮北流民有愿过淮者”；^④嘉泰四年九月，南宋使臣邓友龙贺金正旦，又“有賂驿使夜半求见者，具言金为鞑所困，饥馑连年，民不聊生，王师若来，势如拉朽。”^⑤可见金朝当时已是国乱民离了。此时南宋的主战派大臣，纷纷建言伐金。嘉泰四年正月，“弃疾入见，陈用兵之利，乞付元老大臣……”^⑥这也正与史达祖希望“趁建瓴一举，并收鳌极”的情绪特征相合。为了探清虚实，南宋先后派张嗣古、李璧出使金朝。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载：“韩侂胄亟欲兴师北伐，先用生辰使张嗣古假尚书入敌中，因伺虚实……后又遣李璧，因使事往祠。”史达祖在《龙吟曲》中说：“楚江南，每为神州未复，闌干静，慵登眺…今日征夫在道，敢辞劳？…休寻乔木，独怜遗老…”把一次平常的出使与恨神州未复的壮志联系起来，以为不敢以劳苦相辞，“独怜遗老”，正说明这次出使的不寻常。作为深得韩侂胄信任的僚属，史达祖很可能负有与张、李相同的使命。张嗣古是嘉泰四年的贺金生辰使，李璧是开禧元年的贺金生辰使，二人都发自六月，史达祖使金当在这两年间。

注

①词林纪事 卷十一引楼敬思语。

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卷十二。

③燕翼贻谋录 卷一。

④史记 卷一二二。

⑤同上。

⑥汉书 卷七六。

⑦文献通考 卷三五。

⑧后汉书 卷四五。

⑨后汉书 卷四四。

⑩同上。

⑪同上。

⑫两朝纲目备要 卷七

⑬四朝闻见录 戊集

⑭同上。

⑮同上。

⑯同上。

⑰宋史 卷八五《地理志》

⑱同上。

⑲金史 卷四。

⑳金史 卷九。

㉑同上。

㉒齐天乐 “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”云：“叹三宿迟迟行客。”则史达祖在汴京逗留了几日，归至汴京时间约在九月十八日前后。

㉓两朝纲目备要 卷十。

㉔宋史 卷三九五。

㉕金史 卷九四。

㉖金史 卷九五。

㉗金史 卷十。

㉘宋元通鉴 卷九四。

㉙宋史 卷三十八。

㉚两朝纲目备要 卷九

㉛宋元通鉴 卷九四。

㉜两朝纲目备要 卷九。